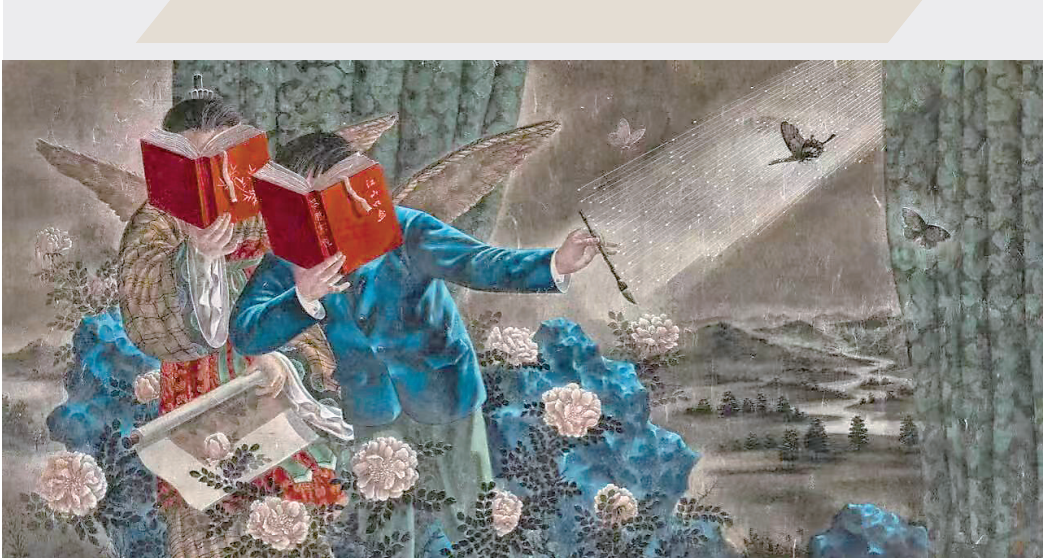




作品名称：《化蝶》

化蝶之外

荣荣

一

我一直好奇,为什么梁祝最后的结局是双双化蝶,而不是化个鸟啊、树啊。深入人心的不是那两句名诗——“在天愿作比翼鸟,在地愿为连理枝”嘛。用自然界的树根纠缠和鸟类双栖,来比喻爱情超越生死的结合,似乎更合常情。后来有心去网上搜检了下,才得知,原来梁祝在早期的传说里也有不同的版本,比如英台殉情后,两人双双化为鸳鸯,还有化为青红二鸟的,也来了个比翼双飞。在云南的一些少数民族版本里,两人死后长出两棵扭在一起的香蕉树,象征生死相依。也正因为有那么多版本,梁祝传说这个文化遗产,曾有不同地方相争。

但最后还是化蝶占据了主导,广为流传。而拥有国内唯一的梁山伯庙和梁山伯墓的宁波,也成为梁祝传说的核心发源地之一。

其实情侣殉情化蝶这样的浪漫,起先并没有安在梁祝头上,最早是出现在战国时期的韩凭夫妇故事里。早期梁祝故事,也只提到合葬、裂坟、投墓,梁祝化蝶结局直到南宋才首见于文字记载,学界也普遍认为该情节是后世受韩凭夫妇故事影响而演变的。

但我喜欢梁祝传说有这样的衍生。蝴蝶这个意象,有多重含义:首先是破茧成蝶,代表着美丽与新生;还有庄周梦蝶里物我两忘的自在;更有在空中翩翩起舞、不受约束的自由。而梁祝传说里最后的双双化蝶,代表着世俗爱情的另一种胜利或另一种绝望——最终以一种非世俗的方式逃逸成功,成为一双轻盈、向上、自由自在、美好得要命的存在。

写到这里就去看手机视频,刷到李元胜的一首小诗,正合适拿来续在此处:《仰俯之间》——“孔子是一个洞穴。朱熹是另一个/能给你提供庇护的,必定有着不同的黑暗。//庄周的蝶,梁祝的蝶,都有人间之外的翅膀/能帮你挣脱的,必定来自相同的绝望。”

二

很小的时候我就知道,宁波西郊有一座不太起眼但香火很旺的庙,那就是梁山伯庙。

“若要夫妻同到老,梁山伯庙到一到。”那时候宁波的年轻夫妻,几乎全是这句俗语的忠实实践者。逢年过节,他们会同去梁山伯庙敬柱香,拜一拜。记得有一辆公交车专门通到那里,编号238,238宁波话谐音就是“梁山伯”,现在,238路公交车仍行驶在那条道上。后来,宁波出了位得过好几届国家民间文艺山花奖的民间文艺达人,在他的努力奔走和潜心挖掘并著书立说之下,梁祝文化园建起来了,梁祝传说也成了国家非遗,他也成为浙江省首个梁祝非遗传承人,他的大名就叫周静书。现在,第二代传承人是他的学生,名叫邵紫丹。邵紫丹本是播音专业的,机缘巧合之下,与梁祝非遗结缘。前几天我与我家先生还应邀专门到她的工作室去看了看。见面的第一眼,我就看见了 she 由内而外的那份恬静。她的工作室前面就是祝府荷花池,占地很大,正是叶肥花好的时节,景色迷人,周遭也安静。这种静仿佛与她的恬静同质同源,又彼此融合交汇。我们随意地聊了一会儿,她说起她的老师,说起梁祝传说,说起她目前更多地做着梁祝文化传播工作,一脸自信与自豪。

然后我们继续在占地很广的梁祝文化园里闲逛。在音乐广场水池那里,我们还看到了五只小的、七只大的,被养得肥肥的大白鹅。想到越剧《十八相送》戏段里,梁山伯因对祝英台屡次的提醒与暗示毫无反应,而被英台比喻为一只大呆鹅,我与我家先生笑说:“这里有十二个大大小小的梁兄呢。”

说完,内心还是自由畅想了一下:如果传说里的梁山伯,在与祝英台相别时,知道了英台的女儿身,他又会怎么做呢?故事又该如何编下去呢?说不定他们最后还是没能在一起吧,还是变成了一对蝴蝶。我记得当时在观剧时,看到那一刻内心替愚笨的梁兄着急,那种着急,是宁愿梁祝终成眷属,过成平凡夫妻,也不要一对飞舞千年的美丽蝴蝶。

三

梁祝文化园是国内首个以梁祝爱情故事为主题的4A级景区,里面有晋代梁山伯古墓遗址,有梁山伯庙,还有很多由此衍生出来的景点,比如祝府、万松书院。每年春季还有梁祝庙会,夏季常有夜游灯光秀活动。梁祝文化园的负责人陈亿红告诉我们,景区相较于过去,一直在做突破性的、能更多吸引游客洄游的尝试,比如水乐园的开放,它将成为游客夏季冲浪消暑的一个好去处。“这个世界上最伟大爱情的诞生地,适合天下有情人专门去打卡游览。”她说,“梁祝文化园要成为宁波一张靓丽的城市名片,对此我们努力着并充满信心。”

梁祝传说广为流传,也得益于多个艺术领域里的各种精彩呈现。记得周静书先生曾在一个梁祝非遗宣传视频里说:“宁波梁山伯庙婚俗,被鼓词、故事、歌谣、传奇、木鱼书、戏剧、曲艺、音乐等艺术形式接受,从而使梁祝传说在民间广为流传,成为中国最具辐射力的口头和非物质文化遗产,并形成了庞大独特的梁祝文化。”

我至今仍记得,20世纪90年代我接待一批国内文学名家,当他们从梁祝文化园转出来后,有一位大作家的感慨:“宁波太厉害了,搞经济宁波太牛了,搞爱情又天下一绝。”

说梁祝爱情天下一绝,应该不是夸大其词。在梁祝文化园入门处,就能看到一块横躺着的巨石,上面书写着“东方爱情圣地”六个大字。其中的“东方”,自然很有说法,那是与比梁祝故事晚了一千多年的莎士比亚著名的爱情悲剧《罗密欧与朱丽叶》相对应来说的。梁祝传说一度被说成了东方的《罗密欧与朱丽叶》。这种说法,有点“你老大我老二”的自贬,其实不说谁比谁更狠,还是各论各的吧。两个故事都讲述因家族或社会阻碍,相恋的人双双死亡而告终,以生命去捍卫爱情自由。但结局处理不同:罗密欧与朱丽叶是现实主义悲剧,梁祝是浪漫主义手法。风格也不同,西方热烈奔放,主动反抗,东方则含蓄隐忍、哀而不伤。

最主要的是,都是故事或传说,编的。就说梁山伯与祝英台吧,两人是真有其人——梁山伯在宁波鄞州出任过县令,祝英台是上虞的一位千金。但据考证:梁山伯存世年代比祝英台早了二百来年。两位历史人物在一个传说里,越过了二百年时空,生死相依了。编此传说的,真是人才呢。起码,他让我们看到了古往今来绝大多数容易向现实屈服与妥协的人,用决绝的爱情来做看上去消极实际上却很积极的抗争:绝望的爱情也可以成为另外一个样子,死是出路,也是希望。

由此引用一下米沃什的短诗《希望》作为小文的结束:

“希望会与你同在,当你相信/大地不是一个梦而是鲜活的生命/那些所闻,所见和所触不会说谎/你曾在这里所看见的一切,如同/透过一扇门所看见的一座花园。”

荣荣:本名褚佩荣,出版过多部诗集及散文随笔集。《文学港》杂志主编,宁波市作协主席,浙江省作协副主席。曾获《诗刊》《诗歌月刊》《人民文学》《北京文学》等刊物年度诗歌奖、中国作家协会集团优秀作家贡献奖、首届徐志摩青年诗人奖、第二届中国女性文学奖、刘章诗歌奖、十月文学奖、鲁迅文学奖等。

我第一次去广州是在20世纪90年代,参加一家媒体的笔会。笔会结束前,负责活动的吴绿星问我:“要不要到海印市场转一下?”

吴绿星身材高大,大嘴,厚嘴唇,声音洪亮,穿一件带黑条的黄T恤,像一只胖蜜蜂。

我问:“那里有什么?”

老吴说:“海印广场是全国最大的CD和VCD批发市场,发烧友都喜欢去那里逛。”

我是小地方人,没听过发烧友这个词,硬着头皮问老吴:“发烧友是干啥的?”

老吴咧开大嘴笑,没有小瞧我的意思,说:“发烧友用最严苛的标准听音乐,对器材有挑剔的要求。你喜欢音乐吗?”

我说:“喜欢。”

老吴说:“要不要换一套器材?”

小地方的人不知道听音乐还要用器材,那时候我用砖头大的录音机听盒式磁带。我再次硬着头皮问老吴:“什么器材?”

老吴来了兴致,说:“第一要有好喇叭,第二要有好功放,第三没那么要紧,搞一个中档CD机就可以了。”

喇叭不是喇叭吗?听音乐用喇叭干嘛?我问老吴:“喇叭……”

老吴说:“最好的喇叭,一对100多万。”

我说:“喇叭不是吹的吗?”

老吴哈哈笑。

他的同事孙启军告诉我,老吴说的喇叭是音箱。原来是这样。我搞不懂这些器材摆在一起是什么样子,但被启蒙了,觉得老吴说得没有错。我问他这一套器材下来多少钱。我当时月工资1200多元,身上带了800元。

老吴说:“你自己定,可以买贵的,也可以买便宜的。”

我羞于说出只带800元钱,广州人有钱,怕他们笑话我。我对老吴说:“你帮我定吧。”

老吴说:“你掏钱,我怎么好帮你定?你准备拿多少钱买一套器材?”

我模模糊糊觉得这是三样东西,音箱、功放、播放器。800元除以3,每样266元,800元够吗?我几乎要说出这句话,但忍住没说。

老吴看出了我的窘迫,不想让我难堪,他说:“现在不讨论钱,先去海印市场看一看再说。”

过了一会儿,老吴和孙启军来到我住的酒店,说:“去海印广场。”

我问:“现在去吗?”

老吴疑惑地反问:“你不想去吗?”

霎时间我头上冒出汗来。每当要花钱,小地方的人脑袋都会冒汗。我预感要花一大笔钱,但我没钱,我含含糊糊说:“我考虑考虑。”

老吴问我:“你考虑买不买音响器材,还是考虑去不去海印广场?”

出汗造成我大脑空白。我说:“这两件事都要考虑考虑。”

老吴哈哈大笑,坐在床边上说:“你考虑吧,我们等你。”

我想说我没钱,我几乎就要说出来,出于羞耻没让这句话说出口——这句话像鲤鱼跃龙门那样往上冲:“我没钱,我没钱”——我用最大的力量把这句话压下去。

老吴抽完一根烟,拍我肩膀。他把斜挎身上的黄色拉链帆布包从身后挪到前边,拉开拉链,里面塞满成捆的钱。广州人真有钱。老吴说:“你如果没带太多的钱,我这里有。”我的大脑转入第二场焦虑:我把老吴的钱花完了,怎么还?这句话像鲤鱼一样往上跳:“怎么还?怎么还?”

老吴点燃第二支烟,说:“你到海印广场买到喜欢的器材,钱不急还我,慢慢来。”

我释然,愉快地说:“走!”我们出宾馆,坐出租车来到海印广场。

海印广场位于越秀区大沙头。第一次来到这里的人,不管是大地方的人,还是小地方的人,都会震撼。我不能说全世界的音响器材都头在这里,但可以听到全世界的音乐。

望不到边的音响店里陈列着光怪陆离的音箱功放,播放着人们一辈子没听过的五花八门的音乐。这些器材看上去极其高级,我不敢上前去摸,如此清晰、深厚、澎湃的音乐,用耳朵听一下已是幸福。我心里说,在这里买上一套好器材,这辈子不白活。

老吴在前面走,我们在后面跟着。我内心的想法是在每个店铺待一会儿,看看器材,听一听音乐,至少把一首曲子听完。但老吴昂着头径直往前走。我怕走丢了,不敢左顾右盼。这里估计能有一万人。

走着,我们进入一个店铺,老吴用粤语跟老板交谈,老板拿几张CD放进功放里。先是海菲兹的小提琴曲——布鲁赫《苏格兰幻想曲》,换了人声——玛利亚·凯莉《爱的幻影》。我几乎被这首歌感动得要哭,赶紧咬牙忍住了。后面是马友友的大提琴曲:《阿帕拉契圆舞曲》。三首曲子放完,老吴问我:“怎么样?”

一个小地方人,有什么资格评论这么高级的音乐?我点头说:“好。”

老吴问:“你用耳朵听,这对喇叭怎么样?”

我没想到过音箱的事,只被音乐打动,点头说:“好,好。”

老吴又问:“后面那个大提琴曲,

我是怎样变成发烧友的

鲍尔吉·原野

你听到松香味没有?”

我没回答。我觉得在现代汉语里松香味属于嗅觉范畴,听不到。

老吴带着焦急的样子追问:“听到没有,松香味?”

我说:“听到了。”

老吴咧嘴笑,他跟老板用粤语讲价。老板声音渐高,脸色渐红,脖颈上的血管突了出来。老吴把他搞得气急败坏,最终成交。

老吴从兜里掏出成捆的现金让老板数,让我在一张纸上写上地址交给店家。老吴说:“我给你买了英国天朗音箱同轴636,刚刚听过这对。”我点头说:“好,好。”

继续逛,我突然发现老吴装钱的帆布包拉链没拉好,露出里面的钱,这是买音箱没花完的余款。我急忙告诉老吴。

老吴把帆布包从背后挪到身前,拉上拉链,告诉我:“钱没人偷的,小偷不听音乐。”这是老吴的幽默。

之后,老吴替我选了一台雅佳功放机和一台NEC播放机。至此,我完成了发烧友入门仪式。

老吴说:“去吃饭。”

我拦住他,说:“咱们不去提货吗?”

老吴问:“提什么货?”

我说:“音箱、功放和播放机呀。”

老吴说:“他们会寄到你家里。”

这时,我作为小地方人的肤浅又暴露了一次。我问:“他们能寄到吗?如果他们不发货,咱们怎么办?”

老吴说:“他们肯定会发货。”

我说:“我提了货随身带着稳妥。”

老吴说:“这么多东西,你怎么能带得了呢?”

我没说话,心里琢磨:万一这三家老板不发货,我也不能上广州找他们啊?

老吴拍我肩膀:“如果你收不到货,找我就好。”说完咧嘴大笑。他每次大笑让我心情安稳,这次也是。

老吴说:“你的三样器材一共花了一万三千多,讲价讲掉两千多,很划算的。”

我被一万三千多这个数字震惊得眼冒金星,忘记谢谢老吴,脑子里回荡:“一万三千,一万三千,一万三千。”我从来没花过这么多钱。

我从广州回到沈阳,很快收到三样器材。急忙打开包装试听。先听马克西姆·文格罗夫的小提琴曲——拉威尔的《茨冈》,再听惠特尼·休斯顿的歌曲——电影《保镖》主题曲,接着是米沙·麦斯基的巴赫《六首无伴奏大提琴组曲》。这些CD也是在海印广场买的。我在50年代建的、到处是老鼠和蟑螂的、两家合住的公安厅宿舍听完这些乐曲,觉得自己变成了另外的人——纯洁而空灵,像一個身上黏满白羽毛的天使,骑着蓝冰马在遥远的星辰之间巡游,手里握着水晶长矛。

在海印广场,老吴还领我到一家店铺听了顶级的连接线,两根线价值二十万元。老吴说:“电里有杂质,这两根线能过滤掉电的杂质。”

我惊讶:“电都出杂质了吗?是发电机质量不好吗?”

老吴摇摇头:“这个不好说。也许煤不过关。”

第二年春节前,我攒够了钱,从邮局汇给老吴,用长途电话告诉他:“钱汇走了。”老吴淡淡地说:“这么急干嘛,有空来广州玩。”随即挂了电话。

我常常想,老吴第一次跟我见面就借我钱,帮我买音响器材,如果我不还钱,他怎么办呢?我想不出他会怎么办。我想起这件事有些后怕——不是我后怕,是替老吴后怕。好在我算是一个好人,把钱还他了。相比之下,老吴比我更好,是一个大地方的人。

鲍尔吉·原野:蒙古族。现任中国作家协会散文委员会副主任。曾获鲁迅文学奖、全国少数民族文学骏马奖、中国出版政府奖,作品两度入选年度“中国好书”。